

〈附錄〉

## 初次重返大陸的感想

沈君山

——「沈宗瀚先生農業學術研討會」於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十七日在北京舉行，上午是追念父親，下午則是兩岸農業發展的比較。對四十年來台灣農業的發展，歷史學家黃俊傑教授有一篇學術性的論文，我在代表家屬致詞時，作了一般性的比較。本文是根據那次講話整理而成，是一個對農業完全外行的，在台灣成長的知識份子，在離開大陸四十一年後，重返家園，匆匆來去，浮光掠影下的感想。

大陸與台灣兩個世界今昔的不同，可以用一個統計數字來說明，父親立志學農的

時候，中國農民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，現在大陸農民還在七成以上。台灣初光復時，農民人口超過百分之六十，但是到今天只剩百分之十六，農業產值更降到總產值百分之五以下。簡單的說，今天台灣已經完全是一個開放競爭的工商社會。「開放競爭」和它衍生出來的價值觀念利弊得失，很貼切的標誌出台灣和大陸兩個社會的差異。

中國的傳統，是不鼓勵競爭的，孔子就曾說過「君子無所爭。」私和懶是人的天性，競爭是利用人「私」的天性來克服「懶」的天性，以求社會的進步，但是，在古代中國農本位天下一統的社會，主要是求不亂，沒有進步卻並不要緊。所以歷來為政之道，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。而且，即使稍有不均，只要下焉者安貧，上焉者樂道，也不至於成大患。所以在傳統的中國社會，就逐漸的建立起一種價值規範；基礎於道德，規束以禮儀，一統於威權，提倡安貧樂道而排斥攘利惟先。這樣的規範，維持了兩千多年不必求變，當然有它客觀的原因，以農為本天下一統的社會基礎正是其中最重要的。

但是在工商本位的多國環境，就不能避免競爭，只有競爭才能生存。歐西諸國，

在這樣的環境裡，經歷三、四百年，孕育建立起一套競爭的倫理，不忌標新攘利，但束之以律法，在公平競爭的原則下，積小我個人之私利以成大我國體之公利。市場經濟、議會政治等制度，自由、民主、個人人權等觀念皆奠基於此。

台灣在日治時候，已經奠定了現代化的初步基礎，光復以後，國民政府治理四十多年，先從經濟，然後政治，逐步的將這套以競爭倫理為基石的西方制度移植進來。大陸則走了另一條路；以階級鬥爭代替個人競爭，在經濟建設方面，這條路已經證明是失敗了。到了八〇年代，採取新的路線，把發展「社會主義生產力」來追求富裕作為第一優先。要摸著石頭過現代化這條河。

台灣社會的現代化，在沒有意識型態的阻礙下，先走了一步，今天獲得不少看得到的成果；如不虞匱乏，有基本自由，可以充分發揮個人潛力，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很有效率等。但也帶來一些問題，這些問題，有的是過渡性的，最明顯的就是「亂」。像國會裡的打架，就是一個例子。這個打架的現象，經過電視轉播，在大陸已經成為台灣式民主的象徵。有一位大陸的親人，見面不久，就私下問我：台灣是不是因為衣食足而不講禮義了？確實，國會打架是台灣社會轉變一個具有代表性的例子。打架現

象本身很快就會過去，但是更深一層的基本政治倫理，卻是永遠改變了。任何政治制度都必會包含制衡的機制，中國古代，制衡是要在忠誠的原則下運作，臣下對皇上，可以犯顏相爭，卻不可有取而代之之心，這是忠誠的制衡。但是現在的民主制度，反對黨就是反對黨，處心積慮的目的就是在取執政黨而代之，是對抗的制衡而非忠誠的制衡。正因為制衡具有對抗性，所以特別重視規則，以期在公平競爭下保持政治生態穩定的演進。但是，過去四十年來，台灣的現代化是在威權體制下走過，用個人的威望權力來代替制度的規範約束，現在從威權體制中解放出來，等於開了水匣，自然有一番紊亂。紊亂會穩定下來，但是水位卻不會再復原。今後台灣的發展，民主和自由這條路，不可能再倒退了。

一個多元競爭的社會，即使發展成熟，總仍免不了不斷的會「亂」，但是亂中有序，形成一種彈性的動態平衡，較諸一元社會剛性的靜態平衡，往往更為穩定。長期看來，競爭體系令人憂慮的不是「亂」，而是隱藏在競爭後面的本質性問題。

競爭像一把兩刃的刀，效率和剝削是它刀刃的兩面，這把刀揮舞出去時，它的光劍影在人與人之間、人與自然之間、和人與自己之間，這三個不同層面上造成了緊

張展的關係。

如何調和個人與週遭在這三個層面上的關係，是歷來仁人志士不斷的探索的問題。科技的發展和社會制度的自我調適，淡化了人與人之間這個層面的問題。一個現代化的社會，將漸漸不虞匱乏，十八、九世紀社會學家（包括馬克思在內）最關切的，因為剝削而造成的貧富不均和工作環境這類問題，在現代化成功以後，將日漸不見迫切。但是，在人與自然和人與自我這兩個層面，科技更加的增加了這把兩刃刀鋒的銳利。今天全世界都已驚覺到生態和環保問題的嚴重。台灣在經濟起飛的過程中，沒有餘力來顧及環保，國富之後，睜開眼睛看看週遭，怵目心驚。有識之士，開始大聲疾呼，以求亡羊補牢，但是，自然不懂以抗爭自保，在舉國爭利的壓力下，如何從輿論上熱鬧的話題，到制度上有效的保護，要跨上很不容易跨的一步。在人與自我的層面，一個競爭的社會，跑得動也好，跑不動也好，人人都得比著跑。急迫、虛無、不安全感等，或強或弱的包圍著每個人，科技加速度式的進展，更加深它的衝激。競爭社會的人，即使是成功者，也大多是安身有餘，立命不足。這個問題，不能完全求助於外來的體系，全盤西化這個口號，實際上不可能做到，即使做到也解決不了問

題，如何將中國傳統上進則儒退則道，中庸知足的安身立命之道，調劑融合於競爭體系之中，應該是中國文化現代化中重要的一環。

我在台灣和美國這兩個社會渡過了半生，第一次回到現代化剛起步的中國大陸，直覺的比較，引起幾許反思。安、和、樂、利是每個社會追求的目標，這三個社會，「利」的水平和成就是差得很遠，但在安、和、樂方面。卻各有各的問題。利是安、和、樂的基礎，卻並不自動的帶來安、和、樂。一個把競爭勝利作為最高價值的現代化社會，常令人聯想起生物演進史上，物種興亡重複不已的規律，舉一個例，有個大角鹿滅亡的故事；大角鹿用角打架，角越大，越打得贏，物競天擇的結果，角越來越大，大到一個地步，轉動不靈，吃不到東西，也照顧不了自己，一下子就全部滅亡了。古生物史上這樣的例子很多，我們憐憫大角鹿的處境，也嘆息它的不知自制，但是仔細想想，它面臨的問題，和今天一個民主競爭社會最後要面臨的問題，其實十分相似。首先，鹿看不到自己的角，大部份鹿，只能直覺到角對幫助打架的即刻的好處，卻難以體會它過份發展潛藏的危機。所以，即使有一、兩隻聰明有遠見的鹿，能看出問題，也難以獲得群鹿「民意」的共鳴與支持。其次，這少數的鹿，自己也面臨

一個辯證的困境；假若角不長大，馬上被別種鹿淘汰掉，如果長大，又可能會被自然淘汰掉。物競和天擇變成對立的兩面；物競是在自己的小環境裡個體間的競爭，天擇是自然（包括自我）規律的抉擇，怎樣處理這兩難的困境呢？

這樣的問題，值得深思。當然，在今天的中國大陸，一定得加速的現代化，不能停留在世界潮流後面，但是，在四十年的停滯後，忽然吹起一切向錢看，惟生產力是尚的旋風，社會結構、價值體系，甚至自然環境，必然會在壓力衝激下，產生種種或短暫或長遠的後遺問題。台灣曾經走過這樣的路，雖然客觀條件不盡相同，但也經歷過不同程度的體會，「台灣經驗」現在是一個有政治涵意的流行名詞，在大陸往往引起抗拒的心理。其實四十年來，台灣的發展在表面的成功下，隱含著許多也許可以避免的失敗。台灣經驗也就是現代化過程中台灣受的教訓。從這個觀點看來，它確是可以攻錯的他山之石。

我們到北京去參加父親的紀念會的時候，兩岸開放來往還只有兩、三年，大陸和台灣的未來，是統一還是分裂？正是一個敏感而具爭議性的話題。但是在我個人的認識中，「統獨」卻從不是一個嚴重有疑惑的問題。一九七三年，我結束了在美國的教

學生涯，回到台灣，當時台灣正被迫離開聯合國，很多朋友都擔心台灣的前途，勸我三思而後行，我寫了一篇文章，答覆他們，其中有一段話，提到未來的兩岸關係：

「台灣和大陸這兩個文化、語言、血緣、風俗相同，而經濟結構、政治制度迥異的地區，會慢慢的由極端的敵對，而不得已的共存，而經濟上互通有無，而人民自由來往。最後，主要由於大陸上經濟成長的需要，政權和體制的性質因而改變，雙方政治和經濟的差異日減，兩個地區的人民再自願聯合形成一個鬆散的統一。」

假若不是有這樣的看法，也許到今天我還在美國中西部的一個小城中教書。而這個看法到今天我仍深信不疑。從歷史的眼光來看，影響兩個鄰接地區上分合的因素，有先天的也有後天的。種族、風格、宗教、信仰語文等這類由歷史形成，可以稱之為廣義的文化因素，不是短期內以人爲的方式所能改變。因此，若在這類先天本質性的問題上，兩個地區之間存在著矛盾互斥的因素，分的趨勢必然大於合的趨勢，反之，合的趨勢就必然大於分的趨勢。至於後天可變的因素，政治的力量是最直接的，但是經濟的力量是最實際的，未來的世界，地區與地區間的關係總是會日趨密切。越是工業化現代化的社會，相互依存的關係越強，經濟因素，如資源市場的互補等，



是整合相互關係最實際的誘因，但從歷史的角度來看，兩個地區的分合，還是決定於（廣義的）文化這個先天性本質性的因素。

從這些客觀因素來看，大陸和台灣未來的趨勢自然是「合」的，現在兩岸關係的發展，大致也正循著由敵對而共存而互補有無而自由來往這樣的方向發展。但是，對於國家主體認識上的分歧，兩岸之間，卻並沒有隨著來往的增加和經濟的接近而減少。將來，它可能超越政經體制的分歧而成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主要障礙。歷史傳統的觀念，「中國」是渾然一體的。在參加研討會之前，我曾到家鄉餘姚去訪問了一次，短短一週內，接觸了不少不同階層的朋友，給我一個深刻印象是：大部份大陸人民，包括幹部在內，對於台灣，除了「有錢」以外，並沒有多少認識，但是，「台灣是中國的」這個概念，卻深植人心。百年來，中國歷經外侮，民族主義成爲凝聚各種力量以禦外侮的良方，因此，在大陸上，民族主義已經被塑造成爲絕對道德的標準。但是，這一百年裡，台灣處在完全不同的環境中。從一八九五年清廷割讓台灣于日本起，其間只有三年是兩岸「真正」處於統一狀態。直到兩三年前，大部份台灣的民衆，從他們祖父這一代起，就沒有踏上過大陸一步。這一百年內，台灣基本上沒有戰

亂，最初是由日本，後來是國民政府，是和大陸隔絕，在威權政治的治理下進行國家建設現代化。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，自然會萌生以台灣本身作為主體的本土意識。對國家民族的感情和認同，自然和大陸同胞有所差距。

今天台灣現代化已小有成，又進入政治上選票第一的民主時代，每年不斷的選舉，「台灣為主體」的本土意識被激發運用作為爭取政權的利器，而不斷升高。本來，本土意識和民族意識不是絕對矛盾的，世界上，包括中國在內，許多地區都存在兩種意識並存而且互補互輔的例子。但是，由於歷史和國際環境的特殊因素，大陸和台灣這兩個文化同質的地區，現在的政治關係是處於不穩定的危險期。二十世紀的最後幾年，大陸上絕對權威領袖已經消逝而台灣議會政治尚未成熟的這段時期，可能最需要警惕，兩岸關係平順的發展，民族文化的同質是基礎，經濟貿易的互補是誘因，但政治上的穩定仍是必然的。一個反映現實的途徑，是在維持現有政經體制的原則下，建立一個中國下平等分治的過渡性架構。在這個架構下，文化學術充分交流，政治經濟各自演進，「制競民擇，適者保存」，讓兩岸在二十一世紀，自然的走向一個政治權力關係鬆散而區域文經關係密切的統合。

歷史的步伐是巨大的，個人的生命，朝代的興衰，在它起伏的間隙中流過，惟有文化民族的源流，悠悠不絕。這次受邀來京參加父親的紀念會，昨天，在慈蔭妹的協助下，得到一個難得的機會，為增進兩岸相互間的了解認識，盡了點別人也許沒有機會盡的力，今天，又能在此和四十餘年沒有見面的親友共聚一堂，父親地下有知，必會含笑頷首，為此我要特別謝謝盧良恕會長和中國農學會的各位同仁。